

云南大学周边外交研究丛书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 云南跨界民族外出务工者研究

孔建勋 邓云斐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云南大学周边外交研究丛书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 云南跨界民族外出务工者研究

孔建勋 邓云斐◎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云南跨界民族外出务工者研究 / 孔建勋, 邓云斐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12

(云南大学周边外交研究丛书)

ISBN 978-7-5161-9058-6

I. ①社… II. ①孔…②邓… III. ①农村劳动力—劳动力转移—研究—云南
IV. ①F3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35609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 茵 马 明
责任校对 胡新芳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6.75
插 页 2
字 数 243 千字
定 价 5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为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云南跨界民族农村富余劳动力异地就业研究”（项目号：10XMZ0056）成果，出版得到云南省“中国陆地边疆治理协同创新中心”资助

云南大学周边外交研究丛书

编委会

主任委员：郑永年

副主任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江瑞平 肖 宪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逸舟	孔建勋	石源华
卢光盛	刘 稚	许利平
李一平	李明江	李晨阳
吴 磊	陈东晓	张景全
张振江	范祚军	胡仕胜
高祖贵	翟 崑	潘志平

总 序

近年来，全球局势急剧变化，国际社会所关切的一个重要议题是：中国在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其外交政策是否会从防御转变为具有进攻性？是否会挑战现存的大国和国际秩序？甚至会单独建立自己主导的国际体系？的确，中国外交在转变。这些年来，中国已经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新型大外交，我称之为“两条腿，一个圈”。一条腿是“与美、欧、俄等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尤其是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另一条腿为主要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即“一带一路”；“一个圈”则体现于中国的周边外交。这三者相互关联，互相影响。不难理解，其中周边外交是中国外交的核心，也是影响另外两条腿行走的关键。这是由中国本身特殊的地缘政治考量所决定的。首先，周边外交是中国在新形势下全球谋篇布局的起点。中国的外交中心在亚洲，亚洲的和平与稳定对中国至关重要，因此是否能处理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良性发展，克服周边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将成为影响中国在亚洲崛起并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关键。其次，周边外交是助推中国“一带一路”主体外交政策的关键之举。“一带一路”已确定为中国主体外交政策，而围绕着“一带一路”的诸多方案意在推动周边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考量的是如何多做一些有利于周边国家的事，并让周边国家适应中国从“韬光养晦”到“有所作为”的转变，并使之愿意合作，加强对中国的信任。无疑，这是对周边外交智慧与策略的极大考验。最后，周边外交也是中国解决中美对抗、中日对抗等大国关系的重要方式与途径。中国充分发挥周边外交效用，巩固与加强同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支持周边国家的发展壮大，提升同中国

的向心力,将降低美日等大国在中国周边地区与国家中的影响力,并化解美国在亚洲同盟与中国对抗的可能性与风险,促成周边国家自觉地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做出适当的调整。

从近几年中国周边外交不断转型和升级来看,中国已经在客观上认识到了周边外交局势的复杂性,并做出积极调整。不过,目前还没能拿出一个更为具体、系统的战略。不难观察到,中国在周边外交的很多方面既缺乏方向,更缺乏行动力,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始终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其中导致该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周边外交研究的不足与相关智库建设的缺失,致使中国的周边外交还有很大的提升和改进空间。云南大学周边外交中心一直紧扣中国周边外交发展的新形势,在中国周边外交研究方面有着深厚的基础、特色定位,并在学术成果与外交实践上硕果颇丰,能为中国周边外交实践起到智力支撑与建言献策的重要作用。第一,在周边外交研究的基础上,云南大学周边外交中心扎实稳固,发展迅速。该中心所依托的云南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在20世纪40年代起就开始了相关研究。进入21世纪初,在东南亚、南亚等领域的研究开始发展与成熟,并与国内外相关研究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同时自2010年起每年举办西南论坛会议成为中国西南地区最高层次的学术性和政策性论坛。2014年申报成功的云南省高校新型智库“西南周边环境与周边外交”中心更在中央、省级相关周边外交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第二,在周边外交的研究定位上,云南大学周边外交中心有着鲜明的特色。该中心以东南亚、南亚为研究主体,以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GMS)、孟中印缅经济走廊(BCIM)和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LMC)等为重点研究方向,并具体围绕区域经济合作、区域安全合作、人文交流、南海问题、跨界民族、水资源合作、替代种植等重点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并不断创新。第三,在周边外交的实际推动工作上,云南大学周边外交中心在服务决策、服务社会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据了解,迄今为止该中心完成的多个应用性对策报告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采纳和认可,起到了很好的咨政服务作用。

云南大学周边外交中心推出的《云南大学周边外交研究丛书》

系列与《云南大学周边外交研究中心智库报告》等系列丛书正是基于中国周边外交新形势以及自身多年在该领域学术研究与实践考察的深厚积淀之上。从周边外交理论研究方面来看,该两套丛书力求基于具体的区域范畴考察、细致的国别研究、详细的案例分析,来构建起一套有助于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的新型周边外交理论,并力求在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孟中印缅经济合作机制、水资源合作机制等方面有所突破与创新。从周边外交的具体案例研究来看,该套丛书结合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实际情况以及实事求是的田野调查,以安全合作、经济合作、人文合作、环境合作、边界冲突等为议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客观独立的分析与思考。从对于国内外中国周边外交学术研究与对外实践外交工作的意义来看,该丛书不仅将为国内相关研究同仁提供借鉴,也将会在国际学界起到交流作用。与此同时,该两套丛书也将为中国周边外交的实践工作的展开提供智力支撑与建言献策的积极作用。

郑永年

2016年11月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1)
第二节 关键概念的界定	(7)
第三节 本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结构	(10)
第二章 文献综述	(12)
第一节 社会资本及测量	(12)
第二节 市场体制下的社会资本与职业获取	(16)
第三节 中国语境下的社会资本与职业获得	(18)
第四节 中国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与异地就业	(19)
第五节 关于云南跨界民族的研究	(23)
小 结	(26)
第三章 调查设计和样本统计描述	(27)
第一节 调查设计和研究方法	(27)
第二节 个人基本特征描述	(30)
第三节 家庭状况	(37)
小 结	(42)
第四章 云南跨界民族务工者异地就业概况	(44)
第一节 首次就业流动年龄	(45)
第二节 工作稳定性和行业分布	(50)
第三节 职业阶层和工资水平	(63)
第四节 劳动强度和工作性质	(74)

第五节 工作待遇和工作满意度	(78)
小 结	(97)
第五章 云南跨界民族务工者的消费与储蓄状况	(99)
第一节 在谋生地的开支	(100)
第二节 外出务工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	(106)
第三节 外出务工收入的用途	(110)
小 结	(122)
第六章 云南跨界民族务工者的异地就业迁移距离	(123)
第一节 境内境外务工描述	(123)
第二节 国内迁移距离	(128)
小 结	(143)
第七章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跨界民族人口异地就业途径	(145)
第一节 云南跨界民族外出务工者的就业途径	(145)
第二节 跨界民族农村富余劳动力异地就业中的 网络关系	(154)
第三节 社会资本与就业途径	(163)
第四节 获取满意工作最主要要素	(189)
小 结	(190)
第八章 云南跨界民族务工者的就业歧视和身份歧视	(191)
第一节 歧视者群体	(195)
第二节 被歧视的原因	(201)
第三节 社会资本与就业歧视	(205)
小 结	(219)
第九章 政策因子对促进跨界民族务工者就业转移 和社会稳定发展的作用	(221)
第一节 描述性分析	(223)

第二节 模型分析	(224)
小 结	(234)
 第十章 结论与讨论	(235)
一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	(235)
二 本研究的基本观点和创新之处	(240)
三 关于促进云南跨界民族农村富余劳动力 转移的措施与建议	(241)
 参考文献	(246)
 后 记	(254)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城市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城乡差别不断扩大。城市的经济繁荣和相应的劳动力缺乏对农村富余劳动力产生了巨大的“拉力”(pull),而农村地区经过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后释放出大量的富余劳动力,从而形成同样巨大的“推力”(push)。这就是西方古典经济学家所说的“推拉理论”(push and pull theory)。正是在“推拉理论”的作用下,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寻求非农就业机会,从而形成了跨世纪全球最大的就业流动大军,也就是俗称的“民工潮”^①。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4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该年度全国农民工总数为 2.73 亿人。^②

然而进入 21 世纪以来,国内出现了“民工潮”和“民工荒”同时并存的矛盾局面,虽然仍有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但一方面农村劳动力转移难度加大、进城务工农民找工作难且劳资纠纷频发,另一方面沿海地区企业却因招不到工人而停产或开工不足。如何有效地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布局和城镇化

① 国内学界和媒体对这一群体有诸多不同的称谓,例如“农民工”、“流动人口”、“外来务工者”等,这些概念之争不属于本书讨论的范畴。对于他们从农村到城里实现就业的现象,我们用“就业流动”这一具学术含义的概念来称呼。

② 国家统计局:《2014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04/t20150429_797821.html。

建设的重要问题，历届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到统筹农村转移劳动力。出现“民工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宏观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也与农民工群体整体素质不高、城市就业环境欠佳等密切相关。事实上，民工荒主要是技工不足，大量来自农村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民工与企业对技术工人的需求无法对接是主要原因。另一方面，资方普遍不尊重农民工，一些地方的用工环境差、工资待遇低，拖欠克扣工资现象严重。不仅如此，大部分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生活成本高、农民工能享受的公共福利少，在打工地落地生根面临诸多限制，因此，“打工不挣钱”、“只有生存没有生活”的状况，迫使很多农民工离开工厂。

总的来说，目前很多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速度、效果都不甚理想，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富余劳动力群体本身的发展来看，面临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到异地就业时，工作流动性较大，所从事的是较低层次的社会职业，工资收入低，工作条件恶劣；二是自发性流动远多于组织性流动，这种自发性就业流动的缺点是流动成本加大，权益相对得不到保障；三是基于亲缘、地缘的社会资本是他们获取职业的主要途径，这种就业流动模式较难实现职业地位的上升，导致职业流动基本上是水平流动。^①另外，由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障碍，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城市的生活会遭受到一系列不公平的待遇，如没有社会保障、孩子上学困难，等等。

非农就业流入城市的农民工长期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存在，他们的就业状况、收入、居住环境、医疗卫生以及随迁子女就学等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对这一现象的研究成果不少，研究的视角也较为多样。例如，有国内学者从教育培训的角度研究中国城市化

① 美国杜克大学著名社会资本大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林楠（Nan Lin）教授指出，社会资本的强关系有助于提升职业声望（亦即向上流动），但该理论似乎不适合农民工的进城务工，因为他们极少拥有林楠教授所说的强关系。参见 Lin, N., “Social Networks and Status Attain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25, 1999, pp. 467-487; Lin, N., and Xie, W., “Occupational Prestige in Urban China”,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3, No. 4, 1988, pp. 793-832。

背景下的农民工城市就业和收入的影响因素。^① 还有学者利用调查数据,从就业特征、劳动保障、小时工资以及人力资源对小时工资的影响几个方面对进城农民工的就业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② 也有学者从社会分层的视角研究农民工的就业流动,认为“农民工的初次职业流动实现了职业地位的较大上升,而农民工的再次职业流动却基本上是水平流动,没有地位上升。农民工再次职业流动地位未能上升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缺少地位积累、地位继承和社会资源”^③。

一 为什么要研究跨界民族的就业流动

如果说农民工作为一个整体属于弱势的话,那么其中的少数民族农民工则是更加弱势的群体,这是因为我国的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总体上比一般的农村地区更加偏僻,自然条件、交通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程度更差,加之语言、文化的差异和普遍落后的受教育程度,使得少数民族农民工在向城市的就业流动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因此他们作为一个中国农民工的次群体也受到部分国内学者的关注。例如,马戎等国内知名学者基于问卷调查数据,从人口统计基本特征、就业概况、收入和消费等方面,研究了西部大城市中的少数民族农民工群体,并在此基础上就地方政府如何针对性地为少数民族农民工的就业、居住、收入、法律援助等方面提供帮助提出了政策建议。^④ 也有学者通过调查少数民族农民工在民族文化村和具有民族特色私营企业中的就业状况,发现“少数民族迁移者因为自身民族文化在城市就业中具有一定的优势。他们不但是城市中的就业迁移者,而且是城市中的民族文化携带者。从进入城市的角色

① Wang Dewen, Cai Fang and Zhang Guoqing, “Factors Influencing Migrant Workers’ Employment and Earnings —The Role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No. 3, 2010, pp. 123–145.

② 高文书:《进城农民工就业状况及收入影响因素分析——以北京、石家庄、沈阳、无锡和东莞为例》,《中国农村经济》2006年第1期。

③ 李强:《中国大陆城市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3期,第93—101页。

④ 马戎等:《西部六城市流动人口调查综合报告》,《西北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第135—174页。

看,他们不但是就业移民,而且是文化移民”^①。此外,有学者通过定性的深入访谈,从社会资本的理论视角探索社会关系网络在少数民族就业流动中的效用,并进一步提出先遣式就业流动阶段、链式迁移就业阶段和网络式就业流动的三段论。认为在不同的阶段作为社会资本的关系网络在这些少数民族的就业流动中发挥着不同形式的作用。^②

如前所述,农民工作为一个整体在城市中处于弱势地位,而少数民族农民工在整个农民工群体中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同样地,在少数民族农民工群体中,跨界民族务工者又处于最为不利的弱势地位。因为与一般少数民族农民工相比,跨界民族的农民工往往来自最为边远、经济发展最为落后和交通基础设施最不便利的边境地区。我国的跨界民族主要分布在陆路边境沿线,由于国内的民族分布格局,全国123个边境县几乎都属于少数民族地区,因此我国的跨界民族地区不仅是边疆欠发达地区,也是少数民族聚居区。这些跨界民族地区一般以发展小农经济为主,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于种养殖业。因此,无论是经济发展程度、受教育程度还是交通条件都比一般少数民族地区更为落后,仅以云南为例,布朗族、德昂族、阿昌族等跨界民族所在地区的社会经济条件比白族、彝族^③、纳西族等其他少数民族地区更加落后,前者在非农就业流动中必然比后者处于最为不利的地位。

此外,除了以上提及的全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普遍存在的问题以外,跨界民族地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还面临一些特殊的困难:第一,在境内就业流动的跨界民族务工者不仅面临同样的二元城乡户籍制度的阻碍,更由于他们自身在宗教信仰、民族风俗、语言交流和生活方式上都与城市人存在比其他务工者更大的差异,从

① 张继焦:《城市中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与迁移就业》,《广西民族研究》2005年第1期,第64—68页。

② 张继焦:《关系网络:少数民族迁移者城市就职中的社会资本》,《云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第64—70页。

③ 在越南北部也有彝族的支系分布,所以有学者主张彝族也是跨界民族。但在多数情况下国内学者一般不把彝族列为跨界民族。

而加大了他们融入城市的困难；第二，对于到境外寻求工作的人来说，他们要重新适应新的生活习惯、宗教环境、不同的社会要求和义务；第三，由于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缺乏有效的组织领导，政府主导的劳动力信息中介缺乏推动力，招聘信息不明朗，劳动力市场封闭，多数务工者仍然依靠亲缘、地缘等社会资本获得工作，可选择性较低；第四，跨界民族地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工作技能差、语言能力不足等客观因素加剧了异地就业的难度；第五，对于到境外工作的跨界民族农村富余劳动力来说，国际上保护这一群体的法律框架尚未构建，所以跨国就业者在迁入国难以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尽管我国边境地区也有较大的汉族人群跨国而居，但在本书的语境下，我们所指的跨界民族是少数民族而非汉族。既然我国的跨界民族主要由少数民族组成，研究跨界民族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异地就业就需要考虑到他们的民族性、宗教性和地域性，结合其民族的特殊性、所处的自然环境及复杂的人文环境来研究。^① 所以针对跨界民族这一特殊的群体，在其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异地就业过程中，需要时刻关注他们的民族性。然而，迄今为止专门针对跨界民族就业流动人口的研究尚不多见，而跨界民族地区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能否顺利实现向城市的就业流动，不仅直接关系到跨界民族农村地区非农收入的增加和地方经济的发展，还直接关系到边境地区的社会秩序和跨界非传统安全问题。因此，研究跨界民族农民工的异地就业流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为什么要选择云南的跨界民族

云南不仅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25个少数民族），而且是跨界民族数量最多和分布最集中的省份，是“一块进行跨界民族研究的得天独厚的宝地”^②。云南边境地区与缅甸、老挝和越南接壤，

^① 马雪鸿、李光明：《少数民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因及障碍研究文献述评》，《北方经济》2012年第13期，第66—67页。

^② 刘稚、申旭：《论云南跨境民族研究》，《云南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第76—83、110页。

在中缅、中老和中越边境都居住着大量的跨界民族。对云南跨界民族的划分,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学者一致认为总共有16个跨界民族,其中中缅边境沿线的跨界民族有佤族、瑶族、哈尼族、拉祜族、景颇族、苗族、阿昌族、怒族、独龙族、德昂族、傈僳族等;中老边境沿线的跨界民族有苗族、瑶族、哈尼族、拉祜族、傣族、彝族和布朗族等;中越边境沿线的跨界民族包括苗族、瑶族、哈尼族、拉祜族、傣族、彝族、壮族和布依族等。云南省的文山、红河、西双版纳、怒江、德宏、保山、思茅、临沧8个州市分别与缅甸北部的掸邦、克钦两个邦,与越南西北部的河江、老街、莱州、山罗、宣光、安沛、永富7个省,以及与老挝北部的丰沙里、南塔、波乔、乌多姆塞、琅勃拉邦、华潘、川圹、沙耶武里8个省接壤。^①上述跨界民族就居住在这一沿线的两侧。跨界民族的同源性和跨居在边境线两侧的特殊性形成了中国西南边疆与东南亚国家特殊的跨民族问题。

与国内其他农村地区一样,云南的跨界民族地区也出现了富余劳动力的异地就业现象,其就业流动最显著的特征:一是由于语言、文化差异和受教育水平偏低等诸多原因,他们在就业流动群体中处于最底层;二是他们就业流动大多具有跨国界的特征。地理区位上相邻、语言沟通的便利以及具有相同的民族认同和民族文化,这些因素为他们的跨国界流动带来了便利,而边民互市、边境贸易合作和通婚则使得跨界民族在经济上、文化上和生活上有了紧密的联系。跨界民族在经济、文化和社会方面的联系很正常,但是一旦在政治方面也发展了联系,就极有可能上升为国家安全问题,跨界民族问题复杂且关系到国家安全和边疆稳定。

因此,研究云南跨界民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要价值。首先,将云南跨界民族流动人口作为研究对象,调查其就业状况、迁移距离、歧视问题以及关系网络下云南跨界民族流动人口的就业途径,对弱势族群的网络关系理论进行再探讨,对补充和丰富国内外有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① 何跃:《非传统安全视角下的云南跨界民族问题》,《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第86—91页。